



深圳大学学术著作出版基金资助
Sponsored by Shenzhen University Foundation for the Publication of Academic Monographs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SHENGCHANXING FUWUYE FAZHAN
YU QUYU JINGJI ZENGZHANG YANJIU

段杰◎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 区域经济增长研究

SHENGCHANXING FUWUYE FAZHAN YU
QUYU JINGJI ZENGZHANG YANJIU

段杰◎著



清华大学出版社
北 京

内 容 简 介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本书首先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相关理论进行了分析与评价,并对生产性服务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关系进行了理论的探讨;同时以深圳为案例进行实证分析。在理论与实证分析的基础上,本书建立了生产性服务业和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对数产出弹性方程,采用回归估计,借以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增长弹性和趋势,以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相关程度;另外,基于现状与特点的分析,本书建立了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综合评价模型,同时选取主因子分析法作为评价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方法。最后本书针对性地提出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与建议。

本书思维严谨,资料翔实,适合相关经济学专业的老师和学生阅读、参考。

本书封面贴有清华大学出版社防伪标签,无标签者不得销售。

版权所有,侵权必究。侵权举报电话:010-62782989 13701121933

图书在版编目(CIP)数据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段杰著. —北京:清华大学出版社, 2014

ISBN 978-7-302-35260-9

I. ①生… II. ①段… III. ①服务业—关系—区域—经济增长—研究—深圳市
IV. ①F719②F12 653

中国版本图书馆CIP数据核字(2014)第016183号

责任编辑:朱敏悦

封面设计:汉风唐韵

责任校对:王凤芝

责任印制:王静怡

出版发行:清华大学出版社

网 址: <http://www.tup.com.cn>, <http://www.wqbook.com>

地 址:北京清华大学学研大厦A座 邮 编:100084

社总机:010-62770175 邮 购:010-62786544

投稿与读者服务:010-62776969, c-service@tup.tsinghua.edu.cn

质 量 反 馈:010-62772015, zhiliang@tup.tsinghua.edu.cn

印 装 者:北京国马印刷厂

经 销:全国新华书店

开 本:170mm×240mm 印 张:14.25 字 数:235千字

版 次:2014年5月第1版 印 次:2014年5月第1次印刷

印 数:1~4000

定 价:29.00元

产品编号:056034-01

序言：写在前面的思考

段杰博士希望我能为她的新作《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研究》作序，我很高兴。段杰博士是一位年轻的学者，有着良好的学术背景和独立研究的能力。她做学问钻研、扎实，有良好的方法论训练与素养以及创新精神；她做人开朗、真诚，具有良好的为人处世理念与宽阔包容的心胸。博士毕业后来到深圳大学的几年里，除了完成繁重的课堂教学外，她把大量时间和精力都投入到了学术研究上，这对一位妻子、母亲来说，是一个“痛并快乐”的历程。当做学问成为一种生活方式时，人面临的就不是取舍的选择，而是兼顾的智慧与能力。对学问的追求是快乐的，尤其当这种追求不是仅仅与评职称联系在一起时；但做学问的严谨是艰巨的，尤其当你身在为学术而学术的努力之中时。段杰博士让我看到了一个“痛并快乐着”的女学者。

借为段杰博士新书作序，想谈一点自己研究的感悟，其实这也是受到了段杰博士研究的启发。中国改革开放 35 年的历程，是由计划走向市场的历程，也是由普遍贫穷走向共同富裕的历程。在市场经济体系确立、完善的进程中，政府职能的转变是一个关键而又艰巨的课题。甚至可以说，真正厘定了政府与市场的边界，成熟、完善的市场经济体系才可以说在中国大土地真正形成了。一个开明、正义的政府是一个国家、人民的福祉所在。

政府公信力是社会最大的公信力。因为对政府的信赖就是对作为公共物品的社会规制的信赖，而对社会规制的信赖是社会秩序的保障。

市场经济是契约经济，诚信并遵守规则是契约的内涵，也是市场经济运行机制的要求。所以市场经济并不是坑蒙拐骗的天然温床，而是体现并实施、遵守规则的交易舞台。成熟、发达、完善的市场经济国家，一定是一个法制的国家，必定是一个享有自由并同时受到约束的国家，必然是一个以诚实守信为基本行为准则的国家，只有人人都是法律的奴隶，才能实现每个人的真正自由。从逻辑上

说,诚信的丧失并不是市场经济之过,而是市场经济机制不健全之果;诚信的缺失是制度的缺失,而是市场经济不完善使然。政府是社会规制这一公共物品的最权威供给者,政府的认知能力,决定了制度供给的能力与水平;制度的绩效优势,即政府的竞争优势。制度重于技术,制度作为“制度资本”不仅是一种稀缺的社会资源,而且更是社会繁荣发展的保障,尤其在诚信社会的营建中。

政府公信力建设,说到底就是制度建设。政府是由个体的人组成的,个人的道德约束固然重要,但从根本上看,制度决定人的选择行为,有什么样的制度安排,就有什么样的人的选择行为。

尽管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是从经济领域中展开的,但改革从来都是社会的改革,它必然涉及政治、经济、制度、法律等方方面面。甚至可以说,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的保障,真正的市场经济体系就无法确立。

中国社会的改革是以社会制度转型为特征的。因此,政府职能的转变必然构成了制度变迁的重要内容。纵观中国社会由计划经济向市场经济转型的历程,正是“全能”政府逐渐走向“守夜人”政府的历程,也正是“权威”政府逐步走向公仆政府的历程。政府是自上而下的制度变迁的发轫者,也是强制性制度变迁的倡导者,同时还是制度这一公共物品的最大的、最有效的供给者。政府的文明程度决定了制度的文明程度,从而决定了一个社会的政治生活文明程度和开明程度。正如穆勒所说:“虽然国家不能决定一个制度如何工作,但是它却有权力决定什么样的制度将存在。”明智的政府可以在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有效地降低社会的变革成本,而政府的低效率、理性的有界性和认知上的局限性,则会增加社会变革的成本支付,甚至会使社会失去最佳决策或机会的选择,从而丧失收获社会变革的最大收益的可能性。没有政治文明和制度文明保障的市场经济,是短命的市场经济。在政府的权力还需要政府的权力来剥夺的体制里,政府的文明决定了社会规制的文明,而文明的社会规制则是自由的市场经济发展的保证。诚信制度安排正是属于这类社会规制的一个重要内容。

制度是一个国家或城市竞争力的核心,所以,提供有利于市场经济的制度,是政府的主要职责。国家与国家之间的竞争是政府能力、理念的竞争。在土地、资源、劳动力等生产要素基本可以自由流动的今天,哪里能提供最有利于市场交易发生的完善的制度环境,能降低交易成本,保护个人产权,有公共的司法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框架,哪个国家或城市就会在竞争中脱颖而出,更能够从事高利润

的经济活动，而不用靠卖苦力。从历史上国家兴衰的历程看，经济上成功的往往不是地大物博、资源丰富的国家或地区，而是拥有各种各样能激励创新与突破的制度的国家与地区。制度的质量从根本上决定了其资源配置的能力和效率，因而决定其竞争实力的强弱。有效率的制度安排还可以克服自然资源和社会资源的不足。如早期的荷兰、英国，以及后来的香港、新加坡都是很好的范例。米尔顿·弗里德曼（Milton Friedman）一直认为，香港是自由市场经济的典范，在世界上其他地方已经不太容易找到类似的版本了。香港的成功在于其有利于市场交易的制度安排，明晰的产权制度和有效的契约执行框架：法治观念、受到限制的政府权力和廉洁高效的公务员队伍，以及政府坚持对经济不积极干预的原则。所谓政府不干预经济，并不是说政府无所作为，完全放任不管，而是说政府在整个市场经济中担任裁判性的中间人角色，致力于制定游戏规则、建立并维护公平交易的平台，致力于解决纠纷、维持公平，政府不逐利，不办大量的政府企业与民争利。香港 150 多年的发展历程和成功的经验并没有得到我们足够的重视和认真的学习。相反，有些人还揣着一种莫名其妙的优越心态，认为香港今天是沾了大陆的光，而不愿意或者没有愿望去正视香港制度层面的成功意义。香港政府一贯恪守的在经济中“不作为”，而在社会生活中“有所作为”的成功准则，是非常值得我们认真学习的。我们的政府学会了这一点，也就真正明白了政府在市场经济中的地位与职能。

从国家层面上看，日本、韩国的商界与政治结合得太过于紧密，逐步形成了非常固定的既得利益结构，要摧毁这个利益格局非常困难，所以日、韩所面临的经济困难其实质是政治制度问题。相反，美国经济 200 多年之所以富有朝气，就是因为它的政治体制不允许在社会经济之上形成既得利益结构，政府出台的一系列反垄断法，保护了自由竞争和市场经济规律的独立尊严。政府决定制度，制度决定竞争力。

政府公信力的确立，要求政府必须完成与市场经济体制相适应的现代政府的职能转变，即从权威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从投资政府走向保障型政府。

在市场经济条件下，现代政府的主要职能就是保护产权，鼓励竞争，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提供良好的制度环境和宽松有序的发展空间，而不是直接地、大规模地生产性投资。市场经济有其自身发展的规律，任何人，包括政府都不可能，也没有办法一厢情愿地凭美好的愿望来主导社会经济。经济发展的真正动力

不是来自于愿望，而是对市场规律的尊重与遵守，这才是推动经济发展的关键所在。所以，我们绝不能以政府替代市场，面对市场规律，任何政府权力的强势都不再是对市场失灵的矫正，而是对市场规律的破坏，而那些有利于经济发展的制度环境，由于具有减少交易费用、降低经济发展成本的制度绩效，因而对我们的社会更具有进步意义（诚信制度安排就属于这样的制度安排）。因此从根本上说，那些为应对全球金融危机而出台的各地政府旨在推动经济高速增长的“大项目”、“大手笔”、“大动作”，虽然不能说它不是推进社会经济发展的一种途径，但是它绝不是一个市场经济国家可持久使用的常态的发展途径。同时，虽然我们不能说政府直接投资是错误的，但我们可以肯定地说直接投资并不是市场经济条件下政府的主要职能。发展是硬道理并不是意味着由政府投资主导市场，而是要求政府以制度供给的方式为市场经济的健康发展保驾护航。任何权力对市场的干预，都会带来资源配置上非市场化的扭曲。最终资源不是流向价格高地，而是被权力和由权力决定的所谓地方政府的发展目标所“绑架”，更多地涌入国有企业和垄断企业。权力对社会资源，尤其是稀缺资源的干预，是对市场机制的一种无情破坏，它扰乱的不仅仅是市场经济的程序，而且又会为寻租和套利行为留下制度上的投机空间。另外，地方政府的所谓“大项目”、“大手笔”、“大动作”，从本质上说，还是在延续着“大跃进”的错误思维方式。比如，不顾国情和现实的发展水平，一味地追求高速度和“世界第一”。高铁的惨剧绝不是技术上的问题，而是发展理念的问题。当人们把对发展的关注点主要放在“第一”或“创造第一”时，必然较少关注发展的代价和发展的民主决策过程。

相对于政府的“大项目”、“大手笔”、“大活动”，我们的社会更需要政府对小企业、小项目的重视，对社会资本，尤其是民间资本的关注，对民间企业的积极性与创造力的保护。正如熊彼特（Joseph Alois Schumpeter）所言，企业家对利润的追逐和实现个人“理想王国”的努力，是社会创新与创造力的生生不息的源泉。在深圳，腾讯、华为的崛起，就是对这种创新和创造力的最富有说服力的诠释。

市场经济体系完善的过程，也是政府逐步完成自身职能转变的过程。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目标决定，我们的政府必须逐渐由威权政府走向服务型政府，由投资型政府转变成提供公共物品的服务型政府。既要防止政策对市场的扭曲，又要从制度层面上遏止权力对市场的寻租。在政府的权力还必须由政府的力量来剥夺

的体制中，政府的文明程度和远见卓识对制度变迁的绩效而言，是至关重要的。另外，还有一个理论问题值得注意，那就是要正确认识凯恩斯主义的作用和影响。凯恩斯主义是社会经济衰退时的权宜之计，而非长久之策。由政府投资解决有效需求不足问题，从而拉动社会总需求是凯恩斯主义的政策目标。但是中国目前面临的不是与经济衰退相伴随的典型意义上的有效需求不足，而是由收入分配不均、贫富差距悬殊带来的“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在这种情况下，政府大量的生产性投资不仅会“挤出”社会资本，而且还会由于投资大都集中于国企或垄断企业而更加不利于解决“结构性”有效需求不足的问题。凯恩斯主义不等于宏观调控，宏观调控不等于政府直接生产性投资。以政府直接生产性投资的方式短期“救市”行，但长期则不可持续。

政府公信力取决于政府施政的透明度，社会规制的正当性与可持续性，办事的效率及廉洁勤政的水平。政府公信力的确立是社会建设的一个重要的组成部分，是最大的社会文明。然而这一切的形成都要求政府要率先解放思想，真正成为先进思想和文明社会规制的代表。

30多年前的中国社会的改革开放，就是从解放思想开始的。如果说改革开放是中国制度变迁的路径，那么解放思想则是这一制度变迁的前提。没有解放思想就不可能有改革开放，而改革开放又把解放思想从观念变成实践。对政府公信力和诚信社会建设的思考，是改革中的社会的一种醒悟。他告诉人们：“改革”远没有完成，“开放”还必须深入，社会经济发展中所出现的问题，仅靠经济增长本身是不可能真正解决的。经济发展会带来社会繁荣，然而繁荣本身并不会自动带来社会的文明。经济的繁荣、制度的文明、社会的昌盛必将共同构成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最终目标。

进一步解放思想意味着摆脱传统意识形态的束缚对今天的中国社会来说，并不是一件已经完成了的事情，而是一件尚未根本解决的问题。约束经济发展的不仅仅是资源，还有比资源更严重的人的思想和观念。无论是30多年前还是30多年后的今天，观念更新，从而解放思想都是中国社会实现改革开放的前提与保障。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能够改变人，而人则能够改变社会。

解放思想意味着政治体制改革和制度文明必须被提到中国社会制度变迁的日程上来。竞争并不是简单的经济指标的对比和赶超，任何经济指标都不是结果的原因而是原因的结果，指标的背后是社会规制，财富不会自发地为财富创造价

值,经济主体永远是制度约束下的人。所以进一步解放思想要求我们,打开国门引进的不能仅仅局限于先进的技术,也不能仅仅局限于资金和设备,还应该包括理念、思想和规则。中国特色绝不应该是对国际惯例的否定,而是对独特发展路径的表述。对人类普世价值观的接受和认同,是社会真正走向富裕与文明的理性选择。

解放思想意味着政府在真正转变职能,成为一个为社会提供公共物品和制度环境的服务型政府的同时,要成为学习型的政府。学习型的政府也是社会的福祉和进步的前提与象征。先有文明的政府,才可能有文明的社会。

制度的文明是社会和谐的保证。同时,社会发展不仅要向资源使用要效益,而且还应该向制度安排要效益。制度作为一种资源,它具有“制度资本”的特质——保障社会秩序和效率,降低交易成本和风险。从制度的形成来看,一方面,人(政府)是制度的供给者,有什么样理念的人(政府),就有什么样的制度,制度的文明与绩效,取决于人(政府)的文明程度及素养;另一方面,观念不能直接改变社会,但观念却可以改变人,而人则能改变社会。改革创新的理念只有通过人的制度创新,才能转变成为造福于社会的制度绩效。从制度供给意义上说,政府是社会诚信的缔造者,是诚信收益的守护者。政府的诚信是社会诚信的最高也是基本的境界。

在自上而下的强制性制度变迁中,政府是产业政策的制定者,尤其对以金融产业为代表的生产性服务产业的指导与监管,更是政府一直以来的重要工作。可以说,发生于几年前的全球金融危机,不仅仅是来自华尔街的贪婪,还有政府的监管缺位和放纵。但生产性服务产业自身发展是有其内在规律的,政府的监管应该是在对产业内在规律遵循基础上的制度环境的营建,而非对产业本身的人为干预。段杰博士的研究正是从产业发展的内在规律出发,对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相关理论进行分析与评价,并在理论与实证分析基础上建立起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之间的双对数产出弹性方程,以回归估计方法分析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的阶段增长弹性与趋势,在确定二者之间的关系模式以及相关程度的数据分析的同时,得出了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器”、“黏合剂”及“辐射力”的作用,威尔逊模型的应用,进一步从方法的科学性上,证明了其结果的合理性与现实性。段杰博士的研究,不仅是一种有相当理论价值与现实意义的探索,更为有兴趣者提供了进一步深入研究、讨论、分析的路径、空间与方

法论。

最后我想说，从某种意义上说，我们的时代缺乏的不是人力、财力，而是对新思想的敏感性与激情。段杰博士的研究正是一种敏感与激情的展示。

陶一桃

二〇一三年十二月四日于桑泰华府

目 录

第一章 引言	(1)
第一节 研究背景	(1)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战略意义	(3)
第二章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相关理论分析	(12)
第一节 服务业的内涵与分类	(12)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的内涵与特征	(16)
第三节 生产性服务业研究评述	(26)
第三章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37)
第一节 经济增长的相关理论分析	(37)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探讨	(44)
第四章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现状与特征分析	(53)
第一节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历程与现状分析	(54)
第二节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特点分析	(64)
第五章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结构及辐射能力比较分析	(69)
第一节 城市生产性服务业结构与辐射能力比较	(70)
第二节 深港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比较分析	(75)
第六章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影响因素与评价分析	(83)
第一节 评价指标的选取与指标体系的建立	(84)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评价模型的构建	(87)
第三节 模型评价结果分析	(91)
第七章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区域经济增长贡献的实证分析	(96)
第一节 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对经济增长的贡献分析	(96)
第二节 生产性服务业与经济增长作用关系的实证检验	(107)

第八章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及现状比较	(114)
第一节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理论分析	(118)
第二节 珠江三角洲城市金融产业集聚和辐射力的现状分析	(133)
第九章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的实证分析	(151)
第一节 金融产业集聚评价指标体系的建立	(152)
第二节 金融产业集聚与区域经济增长关系的实证分析	(157)
第三节 策略与建议	(162)
第十章 发展生产性服务业促进经济增长的策略与建议	(166)
第一节 提升深圳生产性服务业竞争力的策略选择	(166)
第二节 深港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合作发展的必要性与现实性	(174)
第三节 深港两地生产性服务业合作趋势与策略分析	(181)
附录	(190)
附录 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情况企业调查问卷	(190)
附录 2 《前海深港现代服务业合作区总体发展规划》摘要	(195)
附录 3	(202)
参考文献	(206)
后记	(213)

第一章 引言

第一节 研究背景

富克斯 (Victor R. Fuchs) 在 1968 年出版的第一部有关服务理论的专题性研究著作——《服务经济》中通过实证研究, 宣布美国已率先由“工业经济”发展阶段进入到“服务经济”发展阶段, 宣告了“服务经济”时代的来临。欧美等发达国家在 20 世纪 60 年代就基本完成了由工业型经济形态向服务型经济形态的转型, 新兴工业化国家和地区也于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向服务型经济形态转型。服务经济最显著的特征就是服务业在国民经济中的产值和就业比重不断增大, 并在国民经济产业结构中占据主导地位。而在服务业内部, 生产性服务业已经成为发展最为迅速的部分。在发达国家, 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超出了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 发展速度极为迅速。以美国为例, 1982—1986 年服务业的产值年平均增长率为 4.2%, 高于国民生产总值在此期间年均 4.1% 的增长速度, 而同期生产性服务业的年增长率则高达 7.2%。在 OECD 国家的各类服务业从业人数中, 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保险、财务等生产性服务业, 从 1980—1997 年间, OECD 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提高了 4 个百分点, 达到 20%。生产性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还使得世界服务贸易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 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 逐渐从传统服务转向生产性服务。外国直接投资 (FDI) 中服务业投资的总额也明显高于制造业投资的总额, 并开始向金融服务、物流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集中。

这些现象均表明生产性服务业在经济发展中的“助推器”与“黏合剂”作用

越来越突出。所以对于今天的任何一国或者地区来说,大力发展生产性服务业,对促进其经济发展,产业结构改善和整体竞争力的提高都具有十分重要的意义。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深圳的服务业发展迅速,规模不断扩大,服务经济总量仅次于上海、北京和广州,位居全国大中城市的第四位。在深圳服务业规模不断壮大的过程中也伴随着其质量的提高,服务业内部结构不断优化,尤其是生产性服务业得到了长足的发展。2010 年,深圳生产性服务业在第三产业中所占比重已经超过 50%。然而,与发达国家和地区相比,深圳的服务业总体规模仍然偏小,其生产性服务业也尚处于起步阶段,整体竞争力尤其是参与国际竞争的能力弱,这直接影响了深圳城市竞争力的提高和经济的可持续发展。在全球服务业国际转移的大背景下,深圳该如何抓住机遇,把自身所具有的比较优势切实转化为竞争优势,逐渐形成结构更合理、科技含量更高、国际竞争力更强的生产性服务业体系,是深圳经济发展所面临的重大课题。

生产性服务业是现代经济的重要组成部分和经济增长的主导力量,在经济全球化和科学技术迅猛发展的今天,生产性服务业在世界各国尤其是发达国家已发展到了空前的水平,成为许多发达国家的支柱产业,在世界经济发展和国际竞争中的地位日益显著。我国已加入 WTO,这意味着我国将在更大范围内,以更深的层次融入经济全球化的浪潮中,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也正面临着新的机遇和挑战。而深圳作为我国沿海地区对外开放的先锋城市,在全球化的背景之下,无论是自身发展的内在需要,还是产业融合和产业升级的驱使,均离不开生产性服务业的有力支撑,所以加快发展生产性服务业是目前深圳经济发展的客观需要。另外,改革开放以来,由于特有的地理、人文和生产要素等方面的优势,深圳与香港两地经济合作迅猛发展,逐步形成了互补互利、共生共荣的区域关系。香港制造业的大规模北移,使两地形成了香港营销、深圳生产的“前店后厂”模式的跨地域垂直分工格局;但进入 20 世纪 90 年代以后,由于市场、政策及地缘优势逐渐消失,原有的合作模式已很难适应新形势的发展需要。在新世纪香港要实现经济转型,继续保持繁荣、稳定,深圳要建设自主创新型城市,迫切需要两地加快产业结构调整与升级,进一步加强深港经济整合。随着 CEPA 的实施,《珠江三角洲地区改革发展规划纲要(2008—2020)》的出台,深港两地要提高合作的层次,就要以服务业为重点,促进三次产业进一步融合,合作的发展方向是深港经济一体化。其中生产性服务业是服务经济迅速发展的根本力量,其重要性来自

于它对经济增长效率的直接推动与影响。在此背景下,研究生产性服务业发展与区域经济增长既十分必要,又具有现实意义。

第二节 经济全球化背景下生产性服务业研究的战略意义

1. 全球化浪潮下世界生产性服务业发展概况

自 20 世纪 80 年代开始,全球产业结构呈现出“工业经济”向“服务经济”转型的总趋势。1998—2002 年间,全球服务业占 GDP 的比重不断上升,全球服务业增加值占 GDP 的比重由 55% 升至 66%。其中,主要发达国家达到 70%,中等收入国家达到 55%,低收入国家达到 43%。同时,服务业吸收就业比重也呈不断增长的趋势,西方发达国家服务业就业比重普遍达 70% 左右,少数发达国家高达 80% 以上。在服务业内部,生产性服务部门发展迅速,比重不断加大,成为世界经济中增长幅度最快的行业,并带动了全球服务产业结构的不断升级。在发达国家,生产性服务业的增长超出了服务业的平均增长水平,发展迅速。以美国为例,John Tschetter (1987) 的研究表明,1972—1986 年间,美国生产性服务业的产值与就业增长速度远高于同期服务业和整个国民经济的增长速度。在 OECD 国家各类服务业的从业人数中,增长最快的是银行、保险、财务、房地产等生产性服务业。1980—1997 年间,OECD 国家的生产性服务业从业人数提高了 4 个百分点,达到 15%。生产性服务业的蓬勃发展还使得世界服务贸易的内容发生了根本的转变,世界服务贸易结构得到了进一步调整,逐渐从传统服务转向生产性服务。有关数据显示,一直占世界服务贸易额 60% 左右的运输、旅游等服务行业正在呈下降趋势,通信、金融、信息等生产性服务业则增长较快,所占比重不断上升。1988—1999 年全球运输服务贸易年均增长率仅为 2%,而金融、电信服务贸易增长率则高达 7.4%。从世界范围看,外国直接投资(FDI)也开始向金融服务、商务服务、信息服务等生产性服务业领域集中。例如,美国在 2001 年吸收的外国直接投资中就有 1/3 是投向金融保险领域;欧盟吸收的外国

直接投资则主要集中在媒体、金融等领域；日本跨国公司在英国的投资 50% 以上集中在金融保险部门。

表 1-1 美国 1972—1986 年间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增长的比较

	GDP (1986 年, 亿美元)	1972—1982 年间 增长速度 (%)	1982—1986 年间 增长速度 (%)
生产性服务业	2 200	4.9	7.2
服务业	24 950	2.5	4.2
全部经济	37 130	2.0	4.1

资料来源: John Tschetter (1987)。

表 1-2 1970—1991 年间美国、德国和日本生产性服务业就业变化情况 (百万人)

国别	美国		德国		日本	
年份	1970	1991	1970	1987	1970	1990
生产性服务业	6 298	16 350	1 187	1 977	2 522	5 945
银行	1 658	3 286	438	658	729	1 181
保险	1 406	2 419	244	257	376	783
房地产	789	2 081	92	109	274	707
会计	333	660	—	—	93	118
工程	333	833	163	198	268	509
法律服务	409	1 274	—	—	42	85

资料来源: Basedon Castells and Aoyama (1994)。

随着经济全球化和世界生产性服务业规模的不断壮大, 世界生产性服务业还呈现出以下发展趋势: 一是与制造业关系日趋紧密, 呈互动发展态势, 制造业的服务化趋势日益明显, 中间服务所占比例越来越大; 二是服务外包化, 越来越多的企业, 尤其是实力强大的制造企业正不断地将自己不擅长的中间服务业务外包出去; 三是服务方式模块化、网络化, 生产性服务的业务通过不断地拆分和组合, 而由不同的服务企业连贯地进行操作, 进一步提高了服务效率; 四是服务集群化, 生产性服务业的竞争已不再是单个企业的竞争, 而更多地表现为集群竞争, 整个产业链竞争和产业配套能力的竞争。

2. 全球化进程中广东生产性服务业的发展现状

2.1 生产性服务业发展迅速

改革开放 30 多年来,广东凭借特殊的优惠政策和毗邻港澳的地缘优势,经济发展取得了历史性的飞跃,产业结构也发生了深刻的变化。其三次产业构成由 1999 年的 12.1 : 50.4 : 37.5 发展为 2010 年的 5.0 : 50.4 : 44.6。2010 年,广东第三产业实现增加值 20 267.90 亿元,比上年增长 10.2%,对全省 GDP 贡献率高达 35.4%,第三产业中的生产性服务业发展势头更是强劲,其总量和规模走在了全国的前列,尤其是广州和深圳这两个中心城市,其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占第三产业的比重均超过了 50%。在生产性服务业迅速发展的同时,各个构成行业也都有了较快的发展,尤其是房地产、信息咨询、科研服务和文化产业等一些新兴行业,产值和就业人数都增长较快,是所有服务业中增长最明显的行业;随着广东金融服务功能的不断强化和完善,金融业增加值保持平稳的增长,2006 年实现增加值 932.29 亿元,增长幅度达 38.4%;与此同时,省内的商务服务、信息咨询、科研与综合技术服务业也开始具备一定的规模,虽然从业人数较少,但是增长速度快;交通运输与仓储邮政业作为广东的支柱产业,其产值和就业的基数原本就较大,但增长速度不如新兴行业迅速。

表 1-3 2006 年广东省生产性服务业产值和就业人数情况

指标	GDP 产值 (亿元)	比上年增长 (%)	占 GDP 比 重 (%)	从业人数 (万人)	比上年 增长 (%)	占总从业 人数比重 (%)
总计	26 204.47	17.2	100	5 250.09	4.6	100
第一产业	1 577.12	13.1	6.0	1 594.22	-0.1	30.4
第二产业	13 431.82	18.5	51.3	2 037.6	6.3	38.8
第三产业	11 195.53	16.2	42.7	1 618.27	8.3	30.8
交通运输、仓储 邮政业	1 113.77	12.5	4.3	122.59	4.2	2.3
信息传输、计算 机服务业	809.42	17.7	3.1	42.43	15.5	0.9
金融业	932.39	38.4	3.6	30.50	2.3	0.59